



## 公民黨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的管治」提交之意見書 錯失大學管治改革良機

過去二十多年來，香港受惠於長足發展的高等教育界，各間資助大學均努力地發展其獨特的學術特色，它們在規模、經歷、管理風格和與中港及世界的聯繫亦有相當的發展。

在很大程度上，大學在發展上的努力，讓它們為回應急劇膨脹的高等教育界的需要，提升了教學的質素，並在課程設計上加以創新。再者，香港急速發展的學術社群已證實其研究潛力已為本地、以至國際層面的研究界別帶來越來越重要的貢獻。

如果要進一步改革香港的高等教育界，就必須在教學、研究、知識探索和國際連繫方面採取中長期措施，鞏固高等教育界的多元發展，以此作為改革的基礎。

教資會剛發表的報告(**Newby Report**)正確地表達了對部份大學校董會成員並不稱職的關注，更似乎針對性地批評由政府委任的校董會成員乏善可陳的表現，更提出必須採取行動處理。不過，報告竟然沒有提出全面檢討校董委任制度的主張。更令人失望的是報告只集中在討論一些細節如表現評估指標、年報的格式、風險登記冊及授權與匯報機制等。

遺憾地，我們完全看不到剛發表的大學管治報告有就現時的普遍風氣作出批判性的反思。若我們不對現狀作出大刀闊斧的改變，大談香港的大學管治只會鞏固現時為人詬病的管理風氣。

理想地，大學對社會和人類文明的價值，實在取決於大學能否保證學者獨立而自由地實踐使命、竭盡所能、發揮所長。英國的牛津和劍橋傳統而來都是由多所享有高度自主性，自下而上在不同領域發展的學院組成，形成多元而健康發展的學術社群形態。

正因如此，香港學者亦必須守護其學術社群，正如學者 **T. Becher** 指出此舉將有助於抵抗工具主義或管理主義帶來的干預，因這些意識形態往往造成對學術努力的本質產生完全錯誤的理解，甚或建構出荒謬的表現評估指標。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應該主動推廣大學間的協作和夥伴關係，並以此取代本地大學間就研究資助及國際排名、自相殘殺式的全面競爭。新的策略應是在尊重多元和促進團結的精神下，聚焦大學間的聯合行動，以達致最大的進步。

可是自 2002 年宋達能報告以來，我們的大學正面對來自源於經濟工具主義以及官僚管理主義的雙重挑戰。此後，香港的高等教育界出現越來越多分化的現象，引發學生和學者的失望和不滿情緒。

更重要的是，工具主義者會把大學教育視為一種可量化價值的商品，而不是為了學術和知識本身而存在。雖然今天的學者在教學和研究方面表面上仍然可以決定自己的工作，但最終一所大學整體行事的優次和理由，很多時受制於透明度低而僵化的管理決策。

現在應是時候讓各間大學的學術社群決定誰應該進入大學的管治架構。除了各高層人員如院長或部門主管外，更多的教職員及學生代表應有機會進入校董會，更多認同大學宗旨的民間人士也應在不受教資會影響下獲委任進入校董會。大學應有權選擇合適的人協助他們執行，甚至在必要時修訂大學的策略計劃。

行政長官委任大學管治架構成員的權力此時應該告終了，而行政長官兼任大學校監的角色亦應隨之畫上句號。總而言之，對大學而言最重要的是學術尊嚴和學術自決，教資會的報告實在是白白浪費了一次讓大學擺脫不必要操控的機會。

公民黨  
2016 年 6 月